

# 清代川茶、滇茶运销对比研究

张茜

(四川旅游学院 川菜发展研究中心, 四川 成都 610100)

**摘要:** 四川和云南都是中国重要的产茶区。清代川茶实行引岸制,分为腹引、边引、土引,皆纳课征税,川茶中边引占绝大多数,主要运至西藏、青海、甘肃等民族地区。清政府每年向云南征收课税,滇茶除了本省消费之外,还运销至西藏、四川和南亚、东南亚等地。川茶、滇茶入藏具有重要的政治、经济意义。由于清朝政府对川茶和滇茶实行不同的茶法,加之云南商人的开拓精神,滇茶的运销范围更广,影响更大。分析清代川茶、滇茶的运销历史和经验,可促进当代川茶、滇茶茶业经济的新发展。

**关键词:** 清代;川茶;滇茶;茶马古道;运销

**中图分类号:** TS 971.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8730(2018)02-0013-05

四川和云南是世界茶树的原产中心,是中国重要的产茶区,也是著名的茶马古道的源头。由于清朝政府对川茶和滇茶实行不同的茶法,它们的运销也呈现不同的情况。本文尝试通过对清代西南地区两个相邻省份——四川和云南的茶业生产、政策、运销等三个方面的对比研究,梳理总结川茶、滇茶茶业贸易的历史和经验,以史鉴今,以期促进当代川茶、滇茶茶业经济的发展。

## 1 清代川茶生产、政策及运销情况

### 1.1 生产

茶是中国对世界饮食文化的一大重要贡献,中国是茶树的原产地,其中云南、四川等西南地区是茶树原产地的中心。四川地区最早将野生茶树进行人工栽培,是茶叶文化的摇篮,并且首开饮茶、卖茶之先河,在汉晋时期,便形成了中国茶叶消费的中心和茶业贸易集散的中心。汉晋之后,茶的种植、加工向中国的东部和南部逐渐传播,湖南、湖北、广东、江西、广西、浙江等地区的茶业逐渐发展起来。唐代及以后,茶业的生产 and 贸易遍及中国多数地区。唐宋时期,四川的茶业繁荣,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

明末清初,四川地区长期战乱,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茶叶生产严重衰退。清初,政府采取一

系列措施恢复和发展四川地区的经济,如采取“湖广填四川”的政策,直到康熙初年,四川逐渐安定,茶园才重新出现生机,四川茶业恢复并重新成为全国重要的产茶区之一。乾隆时期,川茶的种植范围进一步扩大,虽然在“金川之战”时期,川茶业受到一定的挫折,但战后川茶业迅速恢复并持续发展。“嘉庆以后全川茶叶总产量当在二十五万担左右,按照清制一担茶为100斤,总共有2500万斤。”<sup>[1]</sup><sup>197</sup> 鸦片战争后,直到清代末期,川茶面临来自国内外茶业的前所未有的激烈竞争,川茶业发生严重危机。

### 1.2 政策

《清史稿》载“茶法:我国产茶之地,惟江苏、安徽、江西、浙江、福建、四川、两湖、云贵为最。明时茶法有三:曰官茶,储边易马;曰商茶,给引征课;曰贡茶,则上用也。清因之。于陕甘易番马,他省则召商发引纳课。间有商人赴部领销者,亦有小贩领于本籍州县者,又有州县承引,无商可给,发种茶园户经纪者。户部宝泉局铸制,引由备书例款,直省预期请领,年办年销。茶百斤为一引,不及百斤,谓之畸零,另给护贴。行过残引,皆缴部。开伪造茶引,或作假茶与贩,及私与外国人买卖者,皆按律科罪。”<sup>[2]</sup> 由于地理和川茶业的优势,清朝政府在川茶管理、课税标准和办法等方

收稿日期:2018-03-21

基金项目:四川省教育厅重点项目(15SA0099)

作者简介:张茜(1981-),女,四川旅游学院川菜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从事民俗及饮食文化研究。

面,施行与东南诸省不同的政策。清初四川边茶贸易沿袭明制,继续实行官府专卖和茶马交易。乾隆年间对边茶贸易制度进行了重大改革,即改“官营”或“官商合营”为“商营”,改“茶马交易”为“茶货交易”;并推行一种产、销对口的茶叶“引岸”贸易制。雍正十三年,户部在酌定川省引票办法时说“现今请引省份,俱系一式行销,并无别项名目。惟四川一省,各商领引之后,有在本地各州县销售者;亦有发往土司地方贩卖者;更有运至口外各部落行销者,其间有腹引、土司(引)、边引之分。”<sup>[3]</sup>

引岸制的特点就是根据各茶区的产量、品种和销区的销量、品种,实行产、销对口贸易。这样有利于对不同茶类的生产制造进行宏观控制,做到以销定产。随着引岸制的发展,全川茶叶购销网点的形成,在部颁茶引之外,各种茶票应运而生。乾隆时期,茶叶产量激增,商人除了采购部引的限额以外,农村尚有余茶可购。针对这种情况,川督乃筹集资金贷款给茶商,用以购买农村余茶。贷款采用发放照票的方式,照票一张,购茶一引,征收茶息银一两零八分。茶引由户部统一颁发,四川设盐茶道主管其事。<sup>[1]201</sup>“嘉庆之前,总计全川最高共颁行引票146 713张。其中边引101 317张,土引31 120张,腹引为14 276张。”<sup>[4]</sup>嘉庆以后,由于新辟了一些购销引岸,据统计,川茶引额加上照票等即共有159 026张。<sup>[1]197</sup>

### 1.3 运销

根据清政府川茶引岸制的规定,不同茶引的茶销往不同的区域,因此川茶的运销呈现相对稳定的范围和格局。“四川有腹引、边引、土引之分。腹引行内地,边引行边地,土引行土司。而边引又分三道,其行销打箭炉者,曰南路边引;行销松潘厅者,曰西路边引;行销邛州者,曰邛州边引。皆纳课税,共课银万四千三百四十两,课银四万九千一百七十两,各有奇。”<sup>[2]</sup>

#### 1.3.1 运销边疆民族地区

随着茶业贸易的发展,销往边疆的边茶形成了南路边茶和西路边茶,它们有不同的行销地。其一,南路边茶。主要产区包括雅安、天全、荥经、名山、邛崃等县,以雅安为制造中心,以打箭炉(今康定)为主要集散地。其中行销天全及泸定的冷碛、飞越岭以西一带六番土司地区的,又称“土引”;行销邛崃的,又称“邛州边引”。南路边

茶又通过集散地由藏商、官僧、土司头人等转运至西藏、青海、甘肃等民族地区。上等南路边茶如毛尖、芽细、康砖等甚至还运销到邻邦不丹和尼泊尔。<sup>[5]52</sup>南路边茶在康熙四十年前已颁行茶引,此后各州县不断增加引额,到了乾隆五十八年(1793)已增至104 424张。此外尚有照票约4 000余张。<sup>[1]207</sup>其二,西路边茶。主要产区包括灌县(今都江堰市)、汶川、茂县、大邑、崇庆、彭县、什邡、绵竹、安县、北川、平武等县,以灌县为加工制造中心和集散地,行销松潘、理番、懋功、若尔盖等地(今阿坝藏族自治州属县)。<sup>[5]53</sup>据统计,到了嘉庆二十年(1815),边引占全部茶引的66%,而其中行销打箭炉的茶引占全部茶引、边引的比例分别为53%和79%。<sup>[6]</sup>可见,南路边茶产、销量最多。

#### 1.3.2 运销腹地

川茶大部分销往边疆地区,此外部分还在本地及省外销售。在清政府政策和经济效益驱动下,茶商几乎遍及四川省各县,除了那些历代均为茶叶产销地区之外,一些以前非茶叶产销地区亦成为销售引岸,活跃了川省茶业贸易。如宣汉在清代为腹茶产地,雍正九、十年额定茶引25张,初为本地产、本地销,但当地茶叶产量较高,以后远销至陕甘及重庆万县等地,遂引额增至100张、照票10张。<sup>[1]212</sup>川东北地区的茶叶可运销至陕西、湖北等地。据载,“至大竹河,商贾聚集,为太平通水程所。河自东而西,可行船,山内所产药材、茶叶,由此顺流而下,至陕西紫阳任河口,计程三百六十里,合汉江直达襄樊,襄樊花布等货溯流至此,起早运发各处。”<sup>[7]</sup>

但由于巴蜀地处边隅,政府力主边茶的发展,引岸制中绝大多数的配额都是“边引”,而对于销往内地的“腹引”重视不够,造成了川茶腹茶制茶技艺较为陈旧,市场竞争力逐步下降。光绪三十三年(1907),巴县茶帮帮首李复兴等禀称“蜀川为长江上游之区,巴南为川东产茶最盛之所,南川产茶曾经西人考较,其质良,其性纯,其味浓,其色鲜明而清香,不亚于湘、豫各省之茶质。惜乎蜀处边隅,而于农业树艺一端,毫未讲求精致,园户不知种植,茶商不知焙制,重属茶业渐有江河日下之势。”<sup>[8]</sup>由于国际茶业市场的生产和消费的变化,印度、日本等国茶业的兴起导致东南各省出口茶业萎缩,而后这些省份的茶叶源源不断入川,彼时

四川的腹茶不仅面临相邻省份如云南、湖南、湖北等地茶叶的竞争,还面临东南各省如福建茶叶的竞争,危机四伏。

## 2 清代滇茶生产、政策及运销情况

### 2.1 生产

早期云南少数民族先民种茶是以食用为主。三国两晋时期,孔明兴茶促进了早期云南民族种茶业的发展。唐宋元时期,云南茶叶制法简易,唐樊绰《蛮书》:“茶出银生城界诸山,散收,无采造法,蒙舍蛮以椒姜桂和烹而饮之。”明清时期,制茶技艺有所进步和发展。清代是古代滇茶发展的兴盛时期,并且在滇东南形成方圆近八百里的六大茶山,产销量可观。“雍正七年己酉。总督鄂尔泰奏设总茶店于思茅,以通判司其事。六大山产茶,向系商民在彼地坐放收发,各贩于普洱,上纳税课转运由来已久。”<sup>[9]</sup>随着滇茶贸易量的增大,清政府也在普洱设府,管理茶叶的销售,抽收税银。六大茶山所产茶多集中在普洱府,运至下关加工再销往各地,所产之茶遂称“普洱茶”,普洱茶逐渐在中国名茶中占据重要地位。生产极盛时,普洱茶年产量达8万担。<sup>[10]</sup>除普洱茶外,云南还有大理感通寺茶等,但由于产量有限,影响不如普洱茶。

### 2.2 政策

清代滇茶分官茶、商茶和贡茶三种。顺治十八年(1661),清政府同意达赖喇嘛的要求在北胜州(今永胜县)开茶市以藏马易茶。雍正时期,茶马市改设丽江,茶马贸易税由丽江府收报。在北胜州及后丽江鹤庆所贸易之云南茶,基本是从普洱运来的为方便长途运输的紧压普洱圆茶。因而清政府专门针对普洱茶七子饼特殊的包装及重量为云南制定茶叶的税收办法。“大清会典事例:雍正十三年题准:云南商贩茶,系每七圆为一筒,重四十九两,征收税银三钱二分,于十三年为始,颁给茶引三千,饬发各商行销办课,作为定额,造册题销。”<sup>[11]</sup>规定了普洱茶七子饼的包装及重量,明确记载了向茶叶经营者颁给“茶引”和征收茶税的相关数据。

### 2.3 运销

和云南的其他茶相比,普洱茶的产量、销量及社会影响都最大。因此,下面以普洱茶为例探讨清代滇茶的运销。

### 2.3.1 行销西藏等边疆地区

清政府开茶马市于北胜州后,西藏地区对茶叶的大量需求,极大地促进了滇藏茶业贸易,大量的汉藏商人不断加入到云南与西藏间的茶马交易中。“顺治十八年(1661),思茅年加工茶叶十万担,经普洱过丽江销往西藏茶叶三万驮之多。”<sup>[12]</sup><sup>[163]</sup>他们从滇西北到普洱、思茅地区,用药材等特产交换茶叶后返回藏区,再将滇茶远销到拉萨等地。道光至光绪年间是云南普洱茶发展最兴盛的时期,滇藏茶业贸易一直处于旺销势头。据载,光绪二十四年(1898),“车里人民视茶最为切要,此茶运至思城,发销西藏及十八省地方……古宗人乘思办茶最为大宗,此乃内地贸易也,本大概不与闻……销售西藏之货仍推茶为首,藏商每到必厚携资本货物以作购茶之费”<sup>[13]</sup>。光绪二十九年(1903)(普洱茶)粗者造成团,售与古宗,本年销口甚利,所来(思茅)之马夫大班者较往年众多,年终时聚积一班,计马二千余匹,从未见此”<sup>[14]</sup>。若以上面海关贸易报告从思茅销往西藏之茶,“光绪年间每年约10多万担,交易额约为20万两白银,而且还尚未计算通过民间不同的运输线路和渠道销往西藏的普洱茶”<sup>[12]</sup><sup>[196]</sup>。直到民国初年,普洱茶销往西藏的数量仍在继续发展。

### 2.3.2 行销内地

滇茶除了行销西藏等边疆地区之外,还行銷内地,尤其是四川地区。“普洱茶不仅驰名全国,而且享誉国外。普洱茶之中,以迤邦之雨前茶为第一,色香味俱佳,但大都是运往四川地区。……光绪年间,云南所产的茶叶,本省享用与运往省外者,约各占其总数之半。”<sup>[15]</sup>其中,创新的滇茶产品颇受四川地区的欢迎。《景谷县志》载,光绪年间,景谷街人李文相用晒青毛茶为原料,用土法蒸压,首创出了月饼形的团茶,并将其销售到了下关地区,获得成功。之后,大商号“茂恒”“永昌祥”等将其仿制成碗形茶,并经昆明、昭通运销到四川地区的叙府(今宜宾)、沱江一带,广告词云“沱江水,下关茶,香高味醇品质佳”。从此,“沱茶”的名声大振,深受川人的喜爱。<sup>[16]</sup>可见,创新的产品、创意的广告、过硬的品质再加上运销渠道的畅通,是滇茶打开市场的关键。

### 2.3.3 行销东南亚、南亚地区

随着普洱茶影响的增大,东南亚、南亚地区的印度、缅甸、斯里兰卡、泰国、柬埔寨、越南等国的

商人也前来进行普洱茶贸易,普洱茶也逐渐行销到这些地区。普洱(今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发展成为一个有一定规模的商业集镇,商贾云集,商人把普洱茶运销到东南亚、南亚的很多地方。如思茅钧义祥茶庄有多个代售处和分售处,其中代售处有昆明、上海、香港等地,分售处有缅甸仰光、昔卜、阿瓦(曼德勒),泰国曼谷、景迈(清迈),新加坡等地。<sup>[16]</sup>

六大茶山茶叶产量之首的易武茶山在同治年间茶叶产量大增,茶叶产品主要是七子饼圆茶,又称元宝茶。咸丰后期,由于滇西战乱,滇藏茶马道路受阻,普洱茶由易武转向销往东南亚,并经越南的莱州、老挝的丰沙里等地销往中国香港地区。光绪时期,易武已成为六大茶山最大的茶叶加工、出口基地和内外销售的中转地。普洱茶产销两旺并一直持续至清末民初。这一时期,易武茶(含曼腊)每年外销量从光绪年间的250 000多千克增加至300 000多千克,1897年清政府在易武设立了海关。易武街开设了10多家有名的茶号,海内外的茶号就有10多家,如同庆号、同兴号、同昌号、元昌号等。<sup>[12]</sup><sup>142</sup>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易武“同庆号”茶庄年经营茶叶700担,据易武一位当年帮“同庆号”挑过茶的老人说,茶叶运昆明、越南莱州,四老斤一筒,衙门税和关帝庙里的香火每担出一斤,厘金由茶号庄主缴纳。<sup>[16]</sup>英国人记载,“著名的普洱茶产自倚邦的茶山……有许多江西人和湖南人在倚邦做买卖,每年有大量的货物从倚邦运往缅甸,茶叶交易往来于仰光、掸邦、加尔各答、噶伦堡和锡金”<sup>[12]</sup><sup>145</sup>。

### 3 清代川茶、滇茶运销的对比分析

#### 3.1 川茶、滇茶均销往西藏地区

清朝政府延续了宋代以来的“以茶治边”的政治策略,清代茶主要由三条茶马古道线路传入西藏,一条是北方的唐蕃古道,一条是川藏茶马古道,一条则是滇藏茶马古道。有清一代,川茶和滇茶源源不断地沿着古老的茶马古道运销至西藏等边疆地区,不仅加强了民族联系,增进了民族感情,而且还增强了藏区人民对清朝封建中央政权的向心力,对维护祖国统一起到了很大作用。茶叶是把藏汉两地人民的心连在一起的最好的物质和文化载体。川茶、滇茶入藏,促进了内地和边区物资交流渠道的发展,顺应了茶业经济发展的需要,并带动了相

关经济文化的交流,对促进四川和云南茶业的生产、加工,繁荣西藏、四川、云南的经济和加快边区城镇建设,都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光绪十四年(1888),英国以尼泊尔、不丹等地作为根据地,出兵西藏,发动了第一次侵藏战争。1890年,签订了《中英会议藏印条约》,从此印度的茶叶开始大量倾销西藏。虽然刚开始,藏区民众自发地抵制印度茶,但由于各种因素,印度茶逐渐侵蚀了西藏市场,而川茶、滇茶的茶业生产均因此受到一定的影响,尤其是川茶生产退步很大。在后来的民国时期,中国内外交困,川茶、滇茶的生产 and 运销所遭受的负面影响更大。由此可见,茶运即国运,国家的稳定和强大才是中国茶业经济发展的真正有力保障和坚实牢固的支持。

#### 3.2 滇茶的运销范围更广

在清政府的统筹经济下,出于巩固统治、稳定市场秩序的目的,清政府对四川、云南实行了不同的茶法,而川茶的引岸制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计划经济,束缚了川茶的发展。由于川茶的腹引份额少,在经济利益这个指挥棒的引导下,川茶业注重边茶的生产,与东南诸省相比,川茶的细茶加工技术逐渐落后于东南诸省,以至于到清末,在印度茶和国内诸省茶业的夹击下开始衰退。边茶、腹茶商品流向不同,均有专商经营,保证了茶商的权益,但世袭茶商垄断茶利以后,不思改进,抑制了创新和竞争。反观滇茶,虽然滇茶入藏的数量没有川茶入藏的数量多,但是滇茶的运销却另辟蹊径,更加富有进取精神和商品经济的特点。在云南诸多商号的大力推广、营销下,通过它们设在国内或国外的分号,滇茶运销的范围逐步扩大,影响力逐步提升。在大、小商号的共同努力下,滇茶运销到了南亚、东南亚一带。可以说,在清代滇茶的销售范围要广于川茶,它的销售地不仅有西藏等边疆民族地区、内地,还包括一些东南亚、南亚地区。据统计,清末乃至民国时期,普洱茶主要的运销地国内的有四川泸州、宜宾、重庆、成都、西藏、西康等地,国外的主要有泰国曼谷,印度新德里,马来西亚,新加坡,老挝丰沙里、琅勃拉邦,越南河内、莱州等地,滇茶在清代中后期越来越展现出自己独特的魅力。清代滇茶在运销区域的开拓和产品方面的创新,为它在民国时期中国茶业经济衰退之际的生存和发展,争得了些许机遇和空间,这从民国时期滇茶的运销情况中可以得到证明。

总之,清代川茶和滇茶沿着古老的茶马古道运销至西藏等边疆地区,不仅加强了民族之间的联系,还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区域内地方经济发展,有效地促进了相关地区社会的发展。除了拥有共同的销售市场西藏等边疆地区之外,由于清朝政府对于川茶和滇茶的政策不同,同时由于云南商人的开拓精神,滇茶的运销范围更广,影响更大。笔者通过对清代西南地区两个相邻省份——四川和云南的茶叶运销的对比研究,以探索和总结茶业贸易和经济的经验和规律,以史鉴今,有助于促进在“一带一路”国际倡议下当代川茶、滇茶茶业经济乃至整个中国茶业贸易和经济的新发展。

#### 参考文献:

- [1] 贾大泉,陈一石. 四川茶业史[M]. 成都:巴蜀书社, 1989.
- [2] 赵尔巽. 清史稿:卷一百二十四志九十九食货五[M]. 民国十六年清史馆铅印本:8.
- [3] 彭遵泗. 蜀故:卷四[M]. 清道光十三年刻本:35.
- [4] 常明,杨芳灿. 四川通志:卷六十九食货志 茶法[M]. 嘉庆二十一年刻本.
- [5] 杜长焜. 四川茶叶[M]. 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1.
- [6] 石涛,李欢. 晚清川藏南路边茶探析[J]. 清史研究, 2012(4):63-72.
- [7] 陈明申. 夔行纪程[M]. 黄守红,标点. 朱树人,校订. 长沙:岳麓书社,2013:1174-1175.
- [8] 周邦君. 清代四川茶叶生产研究[J]. 古今农业,2006(4):108-117.
- [9] 倪蜕. 滇云历年传:卷一二[M]. 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2:602.
- [10] 方铁,冯敏. 中国饮食文化史:西南地区卷[M]. 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13:211.
- [11] 方国瑜. 云南史料丛刊:第12卷[M]. 徐文德,木芹,纂录校订. 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269.
- [12] 蒋文中. 茶马古道研究[M].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4.
- [13] 光绪二十四年思茅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M]//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中国旧海关史料(1859-1948):第28册. 北京:京华出版社,2001.
- [14] 光绪二十九年思茅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M]//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中国旧海关史料(1859-1948):第38册. 北京:京华出版社,2001.
- [15] 罗养儒. 云南章故:卷九[M]. 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6:316.
- [16] 黄桂枢. 清代、民国时期景谷、勐腊等地的茶庄商号[J]. 中国茶叶,2008(1):37-39.

## A comparison of Sichuan and Yunnan tea transportation and marketing in Qing Dynasty

ZHANG Qian

(Sichuan Tourism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100 China)

**Abstract:** Sichuan and Yunnan are both important tea producing areas in China. In the Qing Dynasty, Chuan tea was taxed and traded following quota and region system categorized as borderland, hinterland, and chief-tain ruled regions. The majority of the Chuan tea was mainly transported to the ethnic areas such as Tibet, Qinghai and Gansu. The Qing government levied taxes on Yunnan every year. In addition to the consumption in the local province, Yunnan tea was sold to Tibet, Sichuan, South and Southeast Asia. The trade of Sichuan tea and Yunnan tea in Tibet was of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ignificance. Wider area and more influence of Yunnan tea trading came from the different trading rules between Sichuan tea and Yunnan tea, and pioneering spirit of Yunnan merchants in the Qing Dynasty. The analysis of the history and experience of the Sichuan and Yunnan tea trade in the Qing Dynasty could promote the new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y of contemporary Sichuan tea and Yunnan tea industry.

**Key words:** Qing Dynasty; Sichuan tea; Yunnan tea; Tea-Horse Road; distribution

(责任编辑:王芙蓉)